政策、侨力与市场：1952—1991年常山华侨农场商业经营模式变迁研究*

胡娇阳，施鸿娟

摘要：常山华侨农场作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归侨安置基地，其1952—1991年的商业经营模式演变可划分为初创期（1952—1958）的“农业依附型供销模式”、发展期（1959—1978）的“计划主导型综合模式”和转型期（1979—1991）的“外向驱动型多元模式”三个阶段，深刻折射出国家侨务政策调整、归侨群体适应与区域经济转型的复杂互动，共同推动华侨农场从保障型经营向市场型经营转变。这一变迁过程不仅实现了华侨农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完成了特殊组织从国家安置载体到市场经营主体的身份转型，为中国华侨农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关键词：常山华侨农场；商业经营模式；归侨安置；政策变迁；外向型经济

作者胡娇阳，闽南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管理科科长，研究方向：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华侨华人研究；施鸿娟，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华侨华人研究。地址：漳州市，邮编363000。

一、前言

华侨农场是中国政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设立的特殊经济社会组织，承载着安置归侨、发展侨乡经济、维系海外侨情的三重使命。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应对东南亚排华浪潮，国家在福建、广东等省陆续建立一批华侨农场。其中常山华侨农场成为研究华侨农场发展历程的典型个案。1952—1991年，这40年间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剧烈变革，常山华侨农场的商业经营模式也随之历经多次调整，其变迁轨迹既是国家宏观政策落地的微观写照，也是归侨群体适应国内环境的实践记录。

当前学界围绕华侨农场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多集中于归侨社会适应、文化认同、历史变迁与体制改革等方向。在华侨农场整体发展研究上，《中国华侨农场史·福建卷》[①]以志体记述系统梳理了福建华侨农场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但对华侨农场经营模式的专门研究较为薄弱。在归侨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领域，黄湘怡等以海南文昌华侨农场为个案，系统剖析归侨在居住空间、生计方式、生活习俗层面的文化适应过程，指出政策扶持、社区资源与个体能动性是推动其融入社会的核心因素[②]。日本学者奈仓京子以广东华侨农场为田野点，关注中国国内归侨移民社区的研究，提出“多元社区”与归侨文化适应理论，揭示归侨在“故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闽南侨乡民间信俗共同体建构与国际传播研究”（项目编号：FJ2024JDZ042）。

①董中原总主编：《中国华侨农场史·福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黄湘怡，宋永忠：《华侨农场归侨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海南文昌华侨农场为例》，《八桂侨刊》2025年第4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乡”与“他乡”之间的文化重构逻辑[①]。黄静对北京的印尼归侨的调查，则呈现城市散居归侨与农场集中安置归侨的适应差异[②]。在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研究中，学者多以华侨农场的个案研究来管窥归侨群体如何在国家政策背景下建构并调适自身群体认同。陈燕梅、郑一省以宁德东湖塘华侨农场为对象，指出归侨的跨国历史记忆是群体认同的核心纽带，原乡文化在地化是华侨农场独特的文化生成机制[③]。郭海军以常山华侨农场为个案，探讨归侨群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与身份困境[④]。张龙腾以常山华侨农场的印尼、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完整呈现归侨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的适应差异与多重家乡认同[⑤]。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已覆盖华侨农场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维度，但仍存在可拓展空间，如对华侨农场经济经营与社会文化适应的关联研究相对薄弱，较少将农场经济转型与归侨生活变迁、文化调适相结合进行考察。

基于此，本文以福建常山华侨农场为核心研究对象，基于第一手档案资料，通过多维度整合分析，将历史变迁、经济经营、社会适应、政策演变有机结合，完整呈现华侨农场“国家安置载体—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型与归侨“跨国移民—在地居民”的融入全过程，也为全国华侨农场改革、归侨服务保障提供历史参考与经验镜鉴。

二、初创期（1952—1958）：农业依附型供销模式

伴随常山华侨农场的建场进程、安置任务与国家政策导向推进，1952—1958年是常山华侨农场从无到有的奠基阶段。受国家侨务安置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双重约束，常山华侨农场商业活动始终依附于农业生产，呈现典型的保障型、依附性特征。

（一）农业依附型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1952年年底，为安置新加坡、马来亚归国华侨，福建省侨务委员会拨款35万元筹建常山华侨农场（后文简称“华侨农场”或“农场”），首批147名归侨在云霄县大水崛村的300亩贫瘠土地上正式建立安置点[⑥]。此阶段的核心矛盾是“安置生存与生产落后”的冲突：一方面，归侨大多来自东南亚城市地区，缺乏农业生产经验，且面临饮食、语言等文化适应难题；另一方面，农场初建时物质条件极为有限，水利设施近乎空白，农业生产条件恶劣。

在国家政策层面，此时期华侨农场的指导方针为“集中安置、生产自救、经济自给”，商业经营被明确界定为农业生产的配套服务。1953年《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华侨农场工作的指示》提出，农场商业应“以保障归侨基本生活、支持农业生产为首要任务”[⑦]，这种政策定位直接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保障属性。国家对华侨农场的商业定位，本质上是将其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民生保障单元，而非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这一顶层设计从根源上限定了华侨农场商业活动的边界与功能。

---

①[日]奈仓京子：《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黄静：《归侨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适应（1949～1998）——对北京印尼归侨群体的调查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陈燕梅，郑一省：《归侨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初探——以福建宁德市东湖塘华侨农场为例》，《八桂侨刊》2023年第2期。

④郭海军：《农场社区归侨群体认同研究——以常山华侨农场为个案》，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张龙腾：《归国华侨的适应性研究——以福建常山华侨农场印尼归侨和越南归侨为例》，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⑥20周年场庆筹备组编：《常山华侨农场建场二十周年纪念专刊》，1973年，第8页。

⑦《福建省归国华侨常山集体农场一九五三年建场计划（草案）》，1953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农业依附型模式的核心内容与运行机制

为解决归侨“购物难”与“卖粮难”问题，农场逐步建立三级供销服务体系：场部设供销总点，负责物资统筹与农产品收购；生产队设供销分站，承担日常物资供应职责；田间设流动供应点，提供农具、种子等即时服务。1953年，华侨农场供销总点成立初期，商品种类仅30余种，以粮食、布匹、锄头、镰刀等基本生产生活物资为主，全部由省侨委统一调配，按计划定量供应[①]。这种封闭式供应体系，完全切断了华侨农场与外部市场的自主联系，其中的物资流转完全依赖行政指令。

随着归侨人数增加，1955年农场在诏安县新建生产队时，配套建成150平方米供销社与200平方米仓库，商品种类扩展至80余种，新增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此时的供销社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下的分配节点，1958年农业总产值达60万元[②]，对应产出全部供应给场内职工，供销社未形成对外经营能力，农产品收购则执行国家统一牌价，甘蔗、甘薯等主要作物由上级部门按计划调拨。归侨职工的消费需求被严格限定在计划供给范围内，消费选择的单一性进一步强化了华侨农场商业经营的保障属性。

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农场依托自然资源开展简单加工业务。1953年，福建省工业厅派工程师到农场修建日榨甘蔗20吨的白糖加工厂，当年加工甘蔗7600担，产糖250担，但因技术落后导致加工成本极高，出现严重亏损。1955年，农场聘请印尼归侨中的煮糖师傅传授技术，通过改进工艺将加工成本降至每吨2.5元，产糖量提升至1300担，实现盈利0.3万元[③]。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归侨技术资源的独特价值，更说明技术适配性是农场初级加工业务生存的关键。此外，农场还利用归侨技术建立咖啡初制厂与地瓜粉加工厂，1958年加工业总产值达5.05万元，盈利0.68万元[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加工活动均围绕农场农业生产展开，原料全部来自场内种植，产品除少量留用外均由外贸部门收购，形成“农业种植—初级加工—计划销售”的封闭链条，尚未与外部市场建立直接联系。

可见，此阶段的常山华侨农场实行“场部—生产队”的两级管理体制，商业经营由场部供销科直接领导，工作人员以本地抽调干部为主，归侨仅参与基础性销售与加工工作。由于归侨大多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农场成立技术培训班，邀请当地农民传授耕作技术，同时组织归侨中的商业从业者参与供销服务，逐步培养经营人才。在分配机制上，华侨农场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的方式，粮食、布匹等基本物资按人头定量供给，工资则根据劳动强度分级发放。据记载，1958年全农场职工平均月工资仅23元[⑤]。这种保障型分配方式虽稳定了归侨情绪，但也抑制了生产经营积极性，职工的劳动回报与经营效益脱节，难以形成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农业依附型模式的绩效与局限

在安置保障方面，通过供销网络建设与初级加工发展，农场成功解决了所有归侨的基本生活问题，实现“当年建场、当年投产、当年自给”的目标，为后续大规模安置归侨积累了经验。在经济基础方面，1958年农场工农业总产值达28万元，其中商业与加工业产值占比18%，较1953年增长4倍[⑥]，初步形成农业为主、加工为辅、供销配套的经济结构。在群体适应方面，通过参与商业经营活动，归侨逐步熟悉国内经济运行规则，部分归侨的技术特长得到发挥，为后续经营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但该模式初步建立后的局限也显而易见。从经营规模看，农场供销服务仅覆盖场内职工，加工企业产

①《福建省归国华侨常山集体农场一九五三年建场计划（草案）》，1953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②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③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时代变迁中的漳州华侨农场》，2024年版，第30页。

④20周年场庆筹备组编：《常山华侨农场建场二十周年纪念专刊》，1973年，第11页。

⑤《福建省归国华侨常山集体农场关于一九五三—五五年财务情况的报告》，1955年7月12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⑥《常山农场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1958年2月25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能较低，1958年白糖加工厂年产量不足100吨，远低于周边国营糖厂水平；从市场属性看，农场经营活动完全依附于国家计划，物资调配、价格制定、产品销售均由上级部门管控，缺乏自主决策权；从发展动力看，农场以保障安置为核心目标，经济效率被置于次要地位，职工每个劳动日产值仅0.42元，缺乏自我积累与发展能力[①]。这些局限决定了该模式只能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过渡形态，随着归侨安置规模扩大与经济环境变化，农场必然面临转型与升级。

三、发展期（1959—1978）：计划主导型综合模式

1958年后，随着常山华侨农场所有制性质转变、归侨安置规模扩大以及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农场的经营环境与发展任务发生显著变化，原有农业依附型供销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商业经营随之进入以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综合发展阶段。

（一）计划主导型模式转变的驱动因素

1959年，常山华侨农场转为全民所有制，更名为“国营福建省云霄常山华侨农场”[②]，并合并周边3个自然村，土地面积从300亩扩展至1.2万亩，人口增至1200人，经营基础显著增强，总产值约达54万元[③]。这一时期的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明确华侨农场“以农为主、农工商结合”的发展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后文简称“中侨委”）先后共拨款144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创办，在政策上支持常山华侨农场向计划主导型模式发展[④]。全民所有制的确立，使农场彻底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资源调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均由国家统一规划，商业经营的综合性与计划性同步提升。

其次，归侨安置规模的扩大构成了模式转型的直接推动力。1960—1961年，农场接收印尼归侨3801人，1978—1979年又安置越南归侨1359人[⑤]。大规模归侨安置人口给农场带来了双重挑战：一方面须扩大生活物资供应以保障基本生活，另一方面须发展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推动商业经营从简单供销向综合经营扩展。此外，归侨群体的技能优势开始显现。印尼归侨擅长热带作物种植与香料加工，马来亚归侨熟悉商业贸易与物资流通，这些技能与农场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为综合经营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人才支撑。归侨群体的跨国经验与专业技能，成为农场突破单一农业经营、拓展多元产业的核心优势。

（二）计划主导型模式的核心架构与运行实践

1.供销服务网络的体系化发展

常山华侨农场构建起“供销部—管理区站点—生产队代销点”三级服务网络，至1965年共设立供销网点23处，覆盖所有生产生活区域。供销部的商品种类从80余种增至200余种，除粮食、农具等基本物资外，新增缝纫机、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1963年商品销售额达75万元，利润6.5万元，较1958年增长14倍[⑥]。农场供销网络的体系化，不仅提升了民生保障能力，更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的商业运营能力，为综合经营奠定基础。

在农产品流通方面，华侨农场建立“统一收购、计划调拨”机制，1965年收购甘蔗1.2万吨、水果0.8万吨，除按计划供应周边公社外，其余交由外贸部门出口[⑦]。为保障物资运输，农场于1962年组建汽车运输

①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②董中原总主编：《中国华侨农场史·福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70页。

③《国营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五九年工作总结》，1959年12月23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④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⑤董中原总主编：《中国华侨农场史·福建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69页。

⑥《1963年工作总结》（〔63〕场办字第065号），1963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⑦中共国营云霄常山华侨农场委员会，国营云霄常山华侨农场：《国营云霄常山华侨农场一九六五年工作总结和六六年生产工作意见》，1966年1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队，拥有汽车6辆、拖拉机4台，当年运输产值11万元，毛利2万元[①]，形成“采购—仓储—运输—销售”的完整供销链条。物流体系的完善，打破了农场内部的空间限制，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农产品的高效流转。

2.农工商综合产业体系的构建

农业方面，华侨农场依托归侨技术优势发展热带经济作物，建成橡胶园3000亩、咖啡园1500亩、香料园1000亩，1970年经济作物产值达8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5%[②]。工业方面，农场先后创办咖啡粉厂、香料加工厂、农具修配厂等12家企业，其中香料厂利用印尼归侨技术生产香茅油、薄荷油，1965年产量达6.2吨，产值10万元，毛利3万元[③]，产品全部供应外贸部门。热带经济作物与特色加工业的结合，形成了农场独具特色的产业标签，这显著区别于普通国营农场。

服务业方面，1963年，恰逢农场设立十周年，同年5月成立“常山华侨接待站”，即“常山中旅”的前身，建成100平方米餐厅，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中转服务；1979年中旅社大厦竣工，总面积3500平方米，拥有客房32间，当年接待海外华侨华人6.6万人次，利润7万元[④]。接待服务业务的开展，首次将农场商业经营与海外侨情联结，开启了外向型服务的雏形，为后续市场化转型埋下伏笔。至1970年，农场形成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合理占比、优质布局的产业结构，综合经营格局初步成型。

3.计划体制下的管理机制

在管理体制上，华侨农场实行“场部—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的模式，场部设工业科、供销科、服务科分别主管相关业务，管理人员中归侨占比不断提高，仅1978年，农场新增职工736人，其中安置归国华侨500人，且以越南归侨为主。在资源配置上，华侨农场实行“统收统支”制度，所有收入上缴上级侨务部门，支出由财政统一拨付，1978年共获得国家拨款1025.4万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创办[⑤]。这种“统收统支”的模式，虽保障了农场的稳定运营，但也导致其缺乏资金自主支配权，难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经营策略。

在劳动分配上，华侨农场实行“等级工资制”，按技能与职务划分8个等级，归侨技术人员工资较普通职工高20%~30%，以激励其发挥专业优势。但受计划经济束缚，其缺乏生产自主权，1975年香料厂因上级计划调整，减产至2.1吨，产值下降65%[⑥]。计划指令与实际生产需求的脱节，直接制约了农场产业效益的提升，也挫伤了归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三）计划主导型模式的成效与困境

常山华侨农场在计划主导型综合模式下，凸显更为有力的安置保障能力，成功解决了5000余名归侨的就业与生活问题。1978年全农场人均粮食占有量达450公斤，较1958年增长2倍[⑦]。经济规模持续扩大，1970年农场工农业总产值达280万元，较1958年增长9倍，其中工业产值占比从18%提升至35%[⑧]。农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建成水库3座、水电站2座、公路50公里，基本解决灌溉与运输问题，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常山华侨农场的经营陷入了短暂的停滞期。1966—1976年的十年间，常山华侨农场总亏损达400多万元，咖啡豆、橡胶等经济作物被大量摧毁，12家企业中有7家停产[⑨]。计划体制的束缚日益显现，农场的企业生产按上级指标执行，缺乏市场响应能力，1978年农场的工业企业

①中共国营云霄常山华侨农场委员会，国营云霄常山华侨农场：《1953—1962十年工作总结》，1962年1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②《一九七〇年福建省国营农场统计报表·云霄县常山华侨农场》，1973年3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③《常山华侨农场一九六五年会计报告》，1965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④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时代变迁中的漳州华侨农场》，2024年版，第32页。

⑤《国营华侨农场一九七八年综合统计年报》，1979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⑥《云霄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七五年生产财务决算表》，1976年2月8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⑦《云霄常山华侨农场一九八〇年工作初步总结》，1980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⑧《国营华侨农场一九七八年综合统计年报》，1979年，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⑨《一九七六年福建省国营农场统计报表》，1977年1月23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地方国营企业水平。归侨积极性受挫，部分归侨因收入水平低、职业发展受限产生思想波动，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长期的计划管控与外部冲击，使得农场商业经营的活力逐渐枯竭，市场化转型成为必然选择。

四、转型期（1979—1991）：外向驱动型多元模式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进程，华侨农场的管理方式、经营定位与发展方向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作出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常山华侨农场长期受制于计划体制的经营格局被逐步打破，商业经营迈向市场化、外向化、多元化的转型新阶段。

（一）多元模式转型的时代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华侨农场政策发生根本性调整。1980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印发《关于华侨农场、工厂当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推行“包、定、奖”生产责任制，扩大农场企业经营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华侨农场划归地方管理，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些政策为华侨农场突破计划束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保障，彻底改变了其长期作为行政附属单元的定位。

内部政策的施行是华侨农场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力，而国际环境的变化为其转型带来了外部机遇。1980年代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来华投资的意愿增强，同时国际市场对罐头、茶叶等农产品需求旺盛，为农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加之农场自身基础已相对扎实，至1979年已拥有食品厂、茶厂、砖瓦厂、农械厂等独立核算企业6家，职工565人，每年总产值200多万元[①]，具备规模化经营的条件。农场的产业基础、人才储备与侨缘优势，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下得到充分释放。

（二）多元模式的核心内容与创新实践

1.外向型工业体系的构建

农场将罐头产业作为外向型经济的突破口，1981年成立罐头厂临时车间，生产蘑菇罐头235吨，出口222吨，质量获全省第一[②]；1982年投资900万元扩建车间，引进日本全自动生产线，1991年占地面积达120亩，固定资产1400万元，年产罐头4000余吨，产品销至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还销至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创外汇759万美元[③]，成为农场经济支柱。罐头产业的崛起，是农场从初级加工向现代化工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也让农场产品真正融入国际市场。

农场同时发展配套外向型企业。1985年，常山华侨农场茶叶厂改为“常山华侨茶叶专业公司”，属全民所有制性质。茶叶厂生产并出口红碎茶，1990年其产量达125吨，创汇17万美元[④]。农场还利用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7万美元专项援助创建制衣厂，产品出口东南亚，解决100余名归侨就业问题。1991年全农场全民所有制工农业总产值6081.38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其中外向型工业产值占62%，形成以罐头加工为主导的外向型工业体系[⑤]。外向型产业的集群发展，让农场经济彻底摆脱对计划体制的依赖，转向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高效运营。

2.“三来一补”与招商引资突破

依托闽粤交通要道的区位优势，农场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制衣厂、食品厂、五金家具厂等各类工

①《国营华侨农场一九七九年综合统计年报》，1980年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②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时代变迁中的漳州华侨农场》，2024年版，第31页。

③《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九一年工作总结》（常侨场〔1992〕7号），1992年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④ 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⑤《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九一年工作总结》（常侨场〔1992〕7号），1992年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农商企业应时代而生，农场呈现企业投资发展的繁荣格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农场借着对外招商引资的红利期，不断吸引港澳台和国外企业前来投资。1989年与香港金泰洗染厂兴办合营企业，港方投资80万元购置设备，农场以土地、厂房作价35万元入股，年利润20万元，优先安排50名归侨就业[①]。1991年台商陈天自在农场投资80万美元创办华丰食品有限公司，成为漳州地区早期台资企业之一[②]。

农场充分发挥以“侨”为“桥”的联络作用，在香港成立“常山香港同乡会”和“常山香港办事联络处”等，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为农场招商引资。外资企业不仅带来资金与技术，更引入先进管理经验，形成“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并举的外资利用格局。归侨的海外亲缘网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招商资源，成为农场市场化转型的独特优势。

3.商业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

1990年，常山华侨农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生产发展，由过去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1991年，常山华侨农场共有工贸企业13家，从事食品加工、服装、能源及服务行业[③]。个体工商户的兴起，标志着农场商业经营从单一国营向多元主体转变，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常山中旅社完成市场化改造，开展“质量、服务、效益年”活动，增强企业竞争意识，狠抓整改，挖掘潜力，改善服务，提高质量，强化业务培训。1990年其营业收入496.64万元，利润123.53万元[④]，接待旅客涵盖多个国家和地区。

农场在服务业领域不断发展，1990年开通400门自动电话，实现国内外直拨；建设游泳池、电影院等娱乐设施，发展餐饮、住宿、零售等配套服务。保险事业快速发展，至1991年年底，农场参加各种人身保险达6284人，占全场人口的34.91%，全年共计收取保险费45.8万元，比上年增长40.72%[⑤]。除此之外，1992年农场各单位122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金额合计为37820元[⑥]。常山保险站被省保险公司评为1991年度先进保险站，其业务成为农场服务业新增长点。服务业的多元化与现代化，完善了农场的商业生态，增强了整体经营活力。

4.市场化管理体制的建立

在管理体制上，农场实行“场部—公司—企业”三级架构，成立工业总公司、供销总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归侨专业人才占管理层比例达58%。在经营机制上，农场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罐头厂等骨干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明确产值、利润与奖惩挂钩，取消管理干部终身制，建立“能进能出、能工能干、能上能下的干部人事制度”[⑦]。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破除了计划体制的官僚化弊端，提升了农场经营决策效率。在分配机制上，农场实行“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制度，绩效奖金占比达40%~60%，同时允许职工入股分红，1990年全农场职工人均收入953元，劳均年收入2231元[⑧]，创建场以来最高纪录。分配机制的革新，将农场职工收入与经营效益直接挂钩，充分激发了归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与经营创造力，实现个人发展与农场发展的共赢。

（三）多元模式的转型成效与特征

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增长，1991年，农场全民所有制工农业总产值6081.38万元（按1990年不变

①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时代变迁中的漳州华侨农场》，2024年版，第29页。

②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③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时代变迁中的漳州华侨农场》，2024年版，第47页。

④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时代变迁中的漳州华侨农场》，2024年版，第32页。

⑤《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九一年工作总结》（常侨场〔1992〕7号），1992年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⑥国营福建省云霄常山华侨农场：《关于进一步办好计划生育保险的通知》（常侨场〔1992〕37号），1992年8月23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⑦《关于常山罐头厂九二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的试行意见》（常侨场〔1992〕53号），1992年4月20日，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⑧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价），其中工业总产值4264.61万元，比上年增长25.11%，农场销售（经营）总收入7167.98万元，比上年增长2.61%，其中工业产品销售收入4911.51万元，比上年增长4.06%。农场出口产品交货总值3973.1万元，比上年增长6.06%，较1978年的出口创汇能力显著增强，1991年创汇820万美元，成为漳州地区重要出口基地[①]。

农场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喜人的成绩，社会融合深度推进。归侨从“安置对象”转变为“经营主体”，部分归侨成为企业家，同时，吸引台商来农场投资建设，农场社会形象显著提升。据统计，1991—2001年，农场累计吸引台商来投资办企的资金高达2600万美元[②]。归侨群体的身份转型，不仅增强了农场的经营活力，更推动了归侨与本地社会的深度融合，消解了跨国移民的身份隔阂。

在经营目标上，农场实现从“保障安置”到“盈利发展”的转变，1991年全农场利润达320万元[③]，彻底摆脱长期亏损局面；在市场导向下，形成“外向工业为主导、商业服务为支撑、农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在运行机制上，农场建立“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侨力驱动”的三元机制，政策提供发展机遇，市场配置资源要素，归侨技能与侨资侨力形成独特优势。在空间格局上，农场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区域经济网络，成为闽粤边界的商贸物流节点。

五、商业经营模式转变的动力机制与历史逻辑

1952—1991年常山华侨农场商业经营模式完成了三次阶段性转型，这一系列的迭代升级并非偶然，而是多重要素相互交织、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时代政策、归侨力量与区域市场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政策制度：模式变迁的顶层设计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调整构成农场商业经营模式转变的核心驱动力。在初创期，“集中安置、生产自救”政策决定了农场供销模式的保障属性，1953年《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华侨农场工作的指示》明确农场商业“以服务农业生产和归侨生活为唯一宗旨”，限制了农场经营自主权。到发展期，全民所有制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农场综合经营的基本框架，中侨委的专项拨款与物资调配支撑起农场农工商产业体系，但也强化了其经营的计划性。进入转型期，改革开放政策打破制度束缚，1985年《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④]使农场实现三大突破：首先，在管理体制上，从中央直属转为地方管辖，赋予农场经营自主权；其次，在经营机制上，推行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分配模式；最后，在发展方向上，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政策支持。这些政策调整为农场模式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如罐头厂的扩建得益于侨办专项贷款与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政策的每一次迭代，都为农场商业经营松绑赋能，推动其逐步走向市场。

（二）归侨群体：模式变迁的内在支撑

归侨群体始终是农场商业经营模式创新的核心参与者与推动者，其技能优势与适应能力是农场经营模式转变的核心内生动力。在初创期，东南亚归侨带来的热带作物种植技术，使农场职工在贫瘠土地上成功培育甘蔗、咖啡等作物，为供销模式提供农业基础；印尼归侨的煮糖技术改进，直接推动农场白糖加工厂扭亏为盈。到发展期，归侨的专业技能支撑起农场综合经营体系，香料加工、商业贸易等领域的归侨人才成为经营骨干。进入转型期，归侨的侨缘优势与市场意识推动农场外向型经济发展。越南归侨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成为农场罐头厂出口业务的核心团队；印尼归侨利用海外亲属关系拓展销售渠道，使香料油成

①《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九一年工作总结》（常侨场〔1992〕7号），1992年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②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③《常山华侨农场一九九一年工作总结》（常侨场〔1992〕7号），1992年2月，漳州云霄：常山经济开发区藏档案资料。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26号），1985年12月19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功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归侨群体的适应能力不断提升，从初期的“被动安置”到后期的“主动经营”，尤其是趁着改革开放的契机，许多归侨成为个体经营工商户，主动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展现出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

（三）环境条件：模式变迁的外部推力

地理区位与市场环境的变化为农场经营模式转变提供外部支撑。常山华侨农场地处福建南端，跨云霄、诏安两县，毗邻广东汕头，云东、云诏公路贯穿全场，水陆交通便利，这种区位优势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如初创期保障物资运输，发展期促进其与周边地区的物资交换，转型期使其成为承接港澳台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市场环境的变化则直接推动经营方向调整。改革开放前，国内计划市场决定了农场经营的封闭性；80年代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加工品的需求激增，罐头、茶叶等产品出口价格较国内高30%~50%，极大地激发了农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动力。同时，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场能够自主调配资源。1985年，农场罐头厂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各类罐头5957.5吨，产值2208万元，盈利100多万元，实现效益最大化；1988年，罐头厂成为常山华侨农场的“龙头企业”[①]。区位与市场的双重利好，为农场模式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外部条件。

六、结论

1952—1991年常山华侨农场的商业经营模式历经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转变为1952—1958年的“农业依附型供销模式”，以保障归侨基本生活为核心，形成“农业—加工—供销”的封闭链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初步发展。第二次转变为1959—1978年的“计划主导型综合模式”，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构建农工商综合体系，完成从单一供销到多元经营的扩展，但受体制束缚缺乏发展活力。第三次转变为1979—1991年的“外向驱动型多元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发展外向型工业与服务业，实现从计划经营到市场经营的根本性转型。

常山华侨农场商业经营模式变迁的核心逻辑表现为“政策引导—主体响应—环境支撑”的互动机制，即国家政策的阶段性调整构成变迁的制度框架，为归侨群体释放自身技能优势与适应能力提供内在动力，地理区位与市场环境变化形成外部条件。这三者的协同作用推动农场商业经营从保障型向效益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计划型向市场型的转变。这一变迁过程不仅实现了农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完成了特殊组织从国家安置载体到市场经营主体的身份转型，印证了政策适应性与主体能动性在特殊组织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常山华侨农场商业经营模式的变迁历程为当代华侨农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启示。其一，政策创新须保持连续性与针对性，既要通过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也要赋予基层主体自主决策权，如1985年体制改革既明确发展方向，又放开经营自主权，实现政策效能最大化。其二，须充分激发归侨群体的内生动力，通过技能培训、利益联结等方式，将归侨的侨缘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避免其“等靠要”思想的形成。其三，要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区域发展格局，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调整经营策略，在保障基本安置功能的基础上，培育特色产业与核心竞争力。

①张火隆主编：《常山五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hold a dominant advantage), whereas Indian Americans have high voter turnout because of strong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distributed in swing states (states wher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re evenly matched). Second, their mode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differ: Chinese Americans rely on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economy, while Indian Americans rely on tech elites to build cross-ethnic coalitions. Overall, Ind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than Chinese Americans.

Keywords: Chinese Americans and Indian Americans; Electoral Politic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Fiji, Papua New Guinea, and Tonga ····· **Lv Jianying(35)**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overall popul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mall, although thei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vary across countries. Focusing on Fiji, Papua New Guinea, and Tonga, this paper uses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data between 1990 to 2024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o compar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born in China, their share of the total inter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ir gender composition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all three countri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mall and generally stable from 1990 to 2024, with no rapid expansion during 2015-2024. Their share of the total inter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has also generally declined. However, signific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exist across the three countries, which can be characterized respectively as "stable settlement" (Fiji), "family-dependent migration" (Papua New Guinea), and "small-scale migration with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males" (Tonga).

Keywords: New Chinese Immigrants;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Demographic Structure

Research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Nanya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Hainan·····**Zhou Yahui(42)**

Abstract: Hainan is an important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from Hainan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giving rise to a distinctive Nanyang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Today, th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of Haikou, Wenchang, Qionghai, and Wanning still preserve numerous cultural heritage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Nanyang.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s arcaded buildings and ancestral residences of overseas Chinese, wh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compasses beliefs in Mazu and Shuiwei Shengniang, as well as Nanyang-influenced culinary traditions such as Hainanese chicken rice, "Dad's Tea," kaya jam, and pandan cake. These reflect the convergence of Hainan and Nanyang in life skill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while also embodying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emotional ident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s products of mig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Hainan's Nanya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loc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cross-reg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this heritage, explores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ts preserv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response to current challenges. These efforts are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deepe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s: Hainan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Nanyang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Anthropology; Transnational Memory

Research on the Value Composition, Challenges to Value Real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Quanzhou Qiaopi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 **Lv Yaling(54)**

Abstract: Qiaopi archives bear witness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embody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 preserv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spirit of overseas Chinese, Qiaopi archives essentially embody the three-dimensional forms of value identified in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objectified value (the physical Qiaopi documents), embodied value (the spirit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value (their recognition through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heritage registers).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rovid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Qiaopi archives. It calls for a shift from traditional "rescue-oriented preservation" toward a more proactive strategy of "creative revitalization," with coordinated efforts in content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operations. These efforts can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Qiaopi archives and contribute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Qiaopi Archives; Cultural Capital; Value Realization; Quanzhou

Policy,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and the Market: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ercial Management Model of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between 1952 and 1991·····**Hu Jiaoyang, Shi Hongjuan(59)**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settlement base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Fujian Province,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underwent three distinct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its commercial management model between 1952 and 1991, as an "agriculture-dependent supply-and-marketing model"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1952-1958), a "planning-led integrated model"du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1959-1978), and an "outward-oriented diversified model"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1979-1991). This evolution vividly reflect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changes in national policies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he adapt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ich together drove the shift of overseas Chinese farms from welfare-oriented operations toward market-oriented management.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enable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but also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distinctive institution from a state-led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resettlement mechanism in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entity, providing a representative case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farms in China.

Keywords: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Commercial Management Model; Resettlement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Chang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 Study of Fundraising Documents of the Guangxi Association in Bentong, Malaysia
——Evidenc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Rongxian Museum, Guangxi ····· Deng Minqiao(68)

Abstract: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launched extensive fundraising campaigns to support China's war effort. The fundraising documents of the Guangxi Association in Bentong, Pahang, Malaysia, held by the Rongxian Museum, include one donation accountability register and 17 individual donation documents issued under the name "Ou Jun Ji" or "Ou Jun". Dating from May 1938 to September 1940, these materials constitute valuable primary sources documenting the patriotic mov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those of Guangxi origi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ocusing on this collec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sic formats and origins of these documents,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in Bentong, and analyzes the types and amounts of donations as well as the flow of funds. The study finds that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Bentong were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gularity, giving rise to an integrated credit mechanism consisting of an "accountability register-donation documents-remittances" framework. Although Guangxi-origin Chinese occupied a relatively marginal position within the broader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they cut back on their own living expenses and participated in monthly donation campaigns as families or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demonstrating sustained patriotic commitment. Among the documents are two voluntary donation documents, two special donations made through frugality, and 13 monthly donation documents. Together, these materials provide tangible eviden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s sense of unity between family and nation. The spirit of integr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e tradition of publicly recording and verifying donations continue to offer important lessons today.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Guangxi Association; Bentong; Fundraising Documents

The Formation and Pathways of Localiz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Guan Yu Worship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Li Xiang[Malaysia](75)

Abstract: The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of Guan Yu worship in Malaya represent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transn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colonial expansion and social turmoil in late Qing China jointly gave rise to a "tin-mining economic corridor"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attracting large numbers of laborer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these frontier areas, wher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provided little protection and formal legal institutions were largely absent, secret societies assumed the role of self-governing institutions. Guan Yu temples consequently becam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Kongsi, giving rise to a pattern in which association halls and temples functioned as an integrated entity. Within this framework, Guan Yu assumed three distinct roles as a protective deity, an ancestral deity, and a deity invoked in oath-taking.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in 1890, illegal societies were forced underground, while legally recognized temples gradually took over community functions and authority. Guan Yu worship thus evolved from the worship of a deity associated with closed associations into that of an open community guardian. Compared with the processes of orthodox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Vietnam and transformation toward charitable functions in Thailand, Guan Yu worship in Malaya followed a distinctive structural trajectory of localization.

Keywords: Guan Yu Worship; Chinese in Malaya; Secret Societies; Localization

Chinese in Timor: Baba, Hakka, and Cantonese in the Making of East Timor
——Portugu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Timor (1894-1910)
····· By Douglas Kammen [USA] & Chen Jieyang, Translated by Zhou Yunshui, Reviewed by Ma Jianfu(84)

Abstract: Governor Silva,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governor stationed in East Timor, relied on military force to impose direct colonial rule. Measures such as the expropriation of land for plant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sition of head taxes had a devastating impact on indigenous socie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East Timor experienced a contradictory pattern of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ought to control the Chinese through restrictions on residential rights and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it depended on the Chinese to alleviate fiscal deficits and sustain the colonial economy. Through semi-autonomou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Kapitan Cina system, municipal councils,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the Chinese obtained a certain degree of self-governance. Their commercial activities encompassed import trade, coffee exports, landholding and other fields, making them a crucial link between the indigenous subsistence economy and the colonial monetary economy. Chinese immigrants cam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including Cantonese-speaking groups, Hakka communities, and groups associated with the Macanese (Portuguese-Eurasian) population. Significant cultural and class differences existed within the community, making the notion of a unified "Chinese community" problematic. By revealing the racialized nature of Portuguese colonial policies during this period, as well as the complex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simultaneously subject to colonial control and actively sought to expand their own room fo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ommerce on the colonial economy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East Timor.

Keywords: Portuguese Colonial Rule; East Timor; Chinese Community; Commercial Activities; Semi-autonomous Institution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